

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视角下的 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齐 骥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北京 100024)

摘要:文化产业发展是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并实现“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过程。以把握文化产业供给侧与需求侧内涵为逻辑起点,以解决供需侧结构性矛盾为落脚点,着力从要素端与生产端解决文化产业供给侧问题,加强从投资端、出口端和消费端解决文化产业需求侧问题,是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演化、优化文化产业发展动力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文化产业;供给侧;需求侧

中图分类号:G 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6-0035-07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以文化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特征,单纯依赖需求端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传统的货币、财政宽松政策对经济贡献的边际效应也呈现递减趋势,在这一阶段,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提高产业发展效率,“既不能像凯恩斯学派那样单方靠财政刺激需求,也不能学供应学派那样完全靠市场去创造需求”^[1],探索供需协调的创新之路势在必行。文化领域也不例外,如何实现文化产业生产和消费端的平衡,供给和需求侧的协同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文化产业科学、高效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推动需求侧的制度改革”^[2],亟待寻求有效的思路和可行的对策。

一、逻辑起点:把握文化产业供给侧 与需求侧的内涵

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生产和需求两端把握文化产业内涵,实现文化

产业内涵式资源配置,不但要明晰供给侧和需求侧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要从文化产业的运行源头和运行结果、长远转型和近期发展的角度,实现文化产业的双效统一、双端发力。

(一)对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基本认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新词,但“供给”本身并不令人陌生。无论是古典经济学鼻祖色诺芬的《经济论》还是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主题都是研究财富增加的,而财富增加的背后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提升则属于“供给”范畴。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看,文化产业供给侧的着力点是文化产业的要素端和生产端的优化,重点在于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优化配置和行进序列的创新升级。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旨在通过推进文化要素在市场力量配置下自由流动、文化产业在充分竞争中充满活力、文化创新在体制变革中蓬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而需求管理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也是西

收稿日期:2016-1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文化领域供给侧问题研究”(16@ZH006)

作者简介:齐骥,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文化经济、文化产业规划和文化产业集群研究。

方政府宏观管理中的通行做法。其理论渊源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主要观点是政府无为而治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的职能要从“守夜人”变为“调节者”,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提供理论支撑。在我国,需求侧改革和政策措施最主要的着力点有三个方面,即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文化产业需求侧的着力点同样在于加强投资、消费、出口,通过一系列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扩大出口、扩大投资或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是从运行结果出发的,便于宏观调控进行短期的逆周期调节,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侧动力,但不是发展的原动力。而供给侧是从运行源头入手,力图从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根本的、可持续的动力出发,其更加突出长远的转型升级^[3]。

(二)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关系的认识和研判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和各国政策调控的演化过程看,供给与需求之间孰轻孰重的论争便一直存在。但毋庸置疑,供给和需求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供给和需求政策的研判和引导上,究竟是以供给侧作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作为重点,关键是根据当时宏观经济现状做出相机抉择。单纯地放弃需求谈供给或放弃供给谈需求都是片面的。也就是“放弃任何一面都不能称作为一枚完整的硬币,难以体现其真实价值”^[4]。

当前经济形势下,文化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转型,既离不开供给侧,也难以绕开需求侧。在供给侧,要着力解决“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难题,打通过剩产能资源要素向先进产能转移的“中梗阻”,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在需求侧,着力解决“需求下降与需求外移并存”困境,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拓展中高端需求^[5],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深刻认识文化产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着重供给侧发力还是加强需求侧管理,文化产业的发展始终以国际和国内经

济社会发展形势与基本趋向为底色,以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平衡为目标。这既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文化产业供需管理的落脚点。必须认识到,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文化产业同时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制度形态。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应立足于“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和“社会效益”,又要特别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既要体察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实践,也要注重吸取其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供需错配产生的教训。

二、共同困境: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需求下降与外移并存

综观全球,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和我国经济走势与文化产业发展紧密关联并对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形成倒逼,经济转型的新动能与文化产业释放的新能量不断驱动新经济发展。从国内经济动能的交替看,互联网+“双创”与“中国制造2025”引领下的文化产业深度融合与迭代创新日趋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在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底色和我国经济动能交替的背景下,文化产业领域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需求下降与需求外移同在的现象依旧存在,在全球数字文化创意蓬勃兴起,战略性新兴产业愈发占据产业主导驱使下,缺少高技术含量、高原创性文化精品与高品质、高附加值文化消费形势依然严峻。

(一)文化产业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文化生产和消费也面临整体的战略转型。例如从消费群体看,我国中产阶级人数将实现爆发式的增长并在十年后达到2.5亿到3亿(相当于美国或英法德意人口的总和)。庞大中产阶级的崛起,对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提供“高水平供给”和“有效供给”。而在当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中,有“高原”缺“高峰”,文化精品供给不足,相反,在一些领域又存在低端供给过剩,无效供给库存严重的现象,文化产业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已成为制约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瓶颈。

例如在出版领域,从2004年到2014年10年间,我国图书市场库存数量增长近25亿册,而总印数增长18亿册;2014年,全国图书市场纯销售为

777.99 亿元,库存则为 1010 亿元。图书库存的激增,集中反映了出版业与市场间突出的供给侧矛盾,一方面,图书消费已经基本市场化;另一方面,图书生产的市场化程度还远远不足^[6]。而在电视剧领域,作为世界电视剧产量大国,2015 年,全国生产完成并获发行许可的电视剧剧目共计 394 部、16540 集,但播出量只有 8000 集左右。许多低俗供给、低端供给、过剩供给、僵尸供给和呆滞供给等挤占了文化市场,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企业产品积压,高质量、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而生产不足。反观国际市场,优质进口电视往往以强大的有效供给占据更高的收视率。例如《太阳的后裔》只是韩国娱乐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但其每集 23 万美元转播权的价格以及播出 6 集达到 28.5%收视率,播出 15 集时已达 34.8%的收视率,远远高于国产电视剧。在电影市场,我们的影视制作虽然数量年年都在递增,但真正能够打入世界市场的产品却很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占有世界 56%的广播和有线电视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55%的电视票房收入和占全世界总额 1/3 的电影票房收入。我国出版和影视产业发展中呈现出的问题也反映出文化产业供给侧的共同困境。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的作用,引领和推进产业升级,创造更多文化精品力作,夯实经济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迫在眉睫。

(二)文化产业需求下降与需求外移并存

从我国需求侧市场总量看,2015 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4%,比 2014 年提高 15.4%,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向由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的重大转型。但值得关注的是,文化产品和服务显然并未完全适应消费需求转化,文化领域的供给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例如在部分行业领域的需求下降,而海外相关领域消费却不断激增,需求外移的速度也不断扩张。

以旅游消费为例。2013 年,我国大陆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同比下降 2.51%,2014 年,接待入境游客同比下降 0.45%。从市场规模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位。而在出境旅游方面,我国不管是在出境客源市场规模上还是在旅游消费总量上都位居世界第一位。2014 年我国出境旅游规模为 1.09 亿人次,境外支出总规模达到 1648 亿美元^[7],与此

同时,2014 年我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 10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其中,本土消费额为 250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境外消费 810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9%,也就是说,我国消费者 76%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境外^[8]。事实证明,我国文化产业领域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这也进一步折射出当前我国消费尤其是中高端消费的供需结构矛盾问题,如何解决消费市场供需错配问题,促进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也是供需协同发展的出发点。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且日益多样化,文化产业消费类型开始从以中低端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主的基本文化消费转向逐渐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与体验价值的发展型消费,以及更加注重个性化与精品化的享受型消费转变,适应需求侧变化的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三、基本思路:加强供给侧与需求侧互动反馈

从当前国际环境和中国经济走势看,我国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三期叠加”阶段,各方面的问题既表现出复杂性,又呈现出特殊性。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某些领域产能严重过剩、有效需求却不足的情况十分突出,但某些领域,文化产业发展却亟需通过增加杠杆来实现产业倍增。因此,“需要以需求侧管理来为长期供给侧改革保驾护航,通过在需求端创造宽松的宏观环境,引导市场中的创新力量去推动解决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难题,并实现供求之间在短期和长期的双向动态均衡。”^[9]可见,以供需协同为基本思路的调控措施和发展路径成为必然选择,如何既能快速拉动需求,又能激发供给侧活力,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思路。

(一)通过供需调控实现“双效统一”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互动反馈可以更精准地实现文化产业调控目标,激发文化产业的内生动力。一方面,通过适度简政放权和因地制宜的微观政策,充分激发全民创造活力和消费潜能,激活文化企业和企业家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以坚守文化发展红线和文化民生底线为基本要求,加强保障基本文化权益、

改善文化民生基本需求,实现文化效益的最大化。

供给侧和需求侧宏观调控相结合可以更好地调整和优化文化产业的财税、金融、投资、土地、人才和环境政策,形成有利于文化消费升级和文化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知识网络,这种多层次、灵活的知识网络,有利于文化企业主体间的知识共享,创意阶层间的创意碰撞,产生创新氛围,构成创意空间,使企业因弥漫着“产业空气”而具备更强创新能力,从而为文化产业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成长提供支撑。

供给侧和需求侧社会管理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文化产业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同时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制度形态。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立足于“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和“社会效益”,又要特别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既要体察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实践,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和教训。

(二)通过供需反馈实现新旧动能交替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互动反馈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中新旧能动的交替,利用经济新动能,例如“互联网+”、双创和中国制造 2025 等,驱动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将成为优化文化产业供给的重要路径。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传统动能弱化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但新动能也正在加快成长,从需求结构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5 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4%,2016 年上半年,这一贡献率更是达到 73.4%。特别是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持续扩张,文化领域的消费扩张迅速。从产业结构看,文化产业发展良好,以新动能为引领的创新型文化产业增速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4.8 万家企业调查显示,2016 年上半年,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616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9% (名义增长未扣除价格因素),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及相关产业 10 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文化服务业快速增长。其中,5 个行业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为 2502 亿元,增长 29.7%;文化艺术服务业 125 亿元,增长 19.8%;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 496 亿元,增长 17.8%;广播电影电视服务业 712 亿元,增长 16.4%;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 4341 亿元,

增长 11.1%^[10]。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中产阶级人数将实现爆发式的增长并在十年后达到 2.5 亿到 3 亿(相当于美国或英法德意人口的总和)。庞大中产阶级的崛起,对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的作用,引领和推进产业升级,创造更多文化精品力作,才能夯实经济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通过供需互动避免政策单侧失灵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互动反馈可以有效避免文化产业管理中单方面的失灵。在全球化加速、知识经济发展迅猛、创新周期日益缩短的当今时代,在某些尤其是重大社会挑战诸如健康、环境等领域,单靠市场机制不能满足社会需求^[11](P32),且从供给或需求侧某一方面出发的政策体系也存在系统失灵,在应对社会挑战方面未能发挥出令人期待的效果。而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调控,则像是一把剪刀的两翼,两种政策措施要相互配合使用而非替代彼此,可以更好地适应创新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也能够通过互动反馈发挥在文化产业不同增长阶段和不同生命周期进程中的调节与支撑作用,进而避免某一侧的政府及市场失灵。

毋庸置疑,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是由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作用决定的。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环境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信息技术和文化内容及品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将继续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中心。同时,发达国家的知识密集型新兴服务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各自发展的主流。随着国际产业间分工、国际产业内分工日益向国际产品内分工延伸,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转移日益体现为国际产品内工序环节的调整和转移将日益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开源背景和开放环境中,互联网不断加速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互动速度和反馈效果,并直接影响创新的扩散和吸收^[11](P34),强调供需侧的互动反馈可以更好地从全产业联角度关注文化创新并针对文化市场和用户的需求与诉求提供有效供给,进而实现文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四、对策建议:供给侧改革应与需求侧管理协同配合

从当前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实践看,推动文化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助于实现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减少无效供给”的去产能任务;优化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布局,有助于实现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的“补短板”任务,发展壮大文化市场主体,有助于实现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降成本任务。可以说,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既是对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有效配合,又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全面创新引领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例如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配合,正是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增进文化民生的福祉、推动文化业态创新的有效实践。而进一步明确哪些领域、哪些产业、哪些产品在“供给侧”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在“需求侧”应当深化管理创新,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行稳致远必须深入研究的议题。

(一)供需管理双管齐下,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结构

供给和需求是文化产业管理中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文化产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文化资源在市场配置中的错配、错位和产业结构的扭曲、畸形。供给和需求又是相互作用的,发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作用和功能,是文化产业既注重当前增长又注重长远发展的有效路径。

随着文化产业发展步入“深水区”,文化产业的结构将不断优化,以往单纯依靠原始的比较优势或者要素禀赋(如各种资源的丰裕程度)来定位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2]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存在绝对比较优势,以“人口红利”实现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较低“成本优势”的可能性也逐渐降低。在文化企业快速更新的市场环境下,文化产业如何优化自身发展结构,应对市场进行动态性调整,提高产能效率,转变发展模式,提升产业层级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在这一基本态势下,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需要发挥文化产业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来避免或化解经济下行中潜在矛盾和风险,通过需求侧管理为长期供给侧改革保驾护航,实现文化产业的长效发展和可持续更新,有利于文化产业实现跨界资本运作、消费刺激提升和文化产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加速器”作用,进而实现文化产业在市场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侧重于引导市场中的创新力量去推动解决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域高端供给不

足的结构问题的特点,对于实现供求之间在短期和长期的双向动态均衡将起到重要作用。无疑,掌控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文化经济发展环境,实现文化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互动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文化产业发展不可回避的命题。

(二)供需网络协同创新,促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形成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从而产生“1+1+1>3”的非线性效用^[3]。以协同创新为组织形态,以跨地域、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方式整合资源,实现“新供给创造出新需求”是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和跨界发展的有益探索 and 良好范式。

当前,“文化+”和“互联网+”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作为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发展趋向和创新维度,它们如同圆心和圆周,分别是供给侧改革战略思维和战略路径,有利于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增进文化民生的福祉、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激活文化供给增长内生动力,推动新的文化业态不断融合、演绎、更迭、创新。借助“文化+”带来的创新思维与“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命的契机,“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建立起‘产品生产—需求反馈—个性化生产’的良性互动关系”^[4],促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文化产业协同创新和核心内容。

“文化+”是以文化为引领的产业的横纵联合从而满足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为文化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模式、新业态。“文化+”的融合内容主要包括:以技术全面创新促进文化科技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改造传统文化行业,提升要素利用效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以品质化和品牌化方式促进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文化旅游内容和形式的开发深度,提高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强度;以资本制度创新促进文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创新文化资产管理方式和创新文化金融服务组织形式,推动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以创意设计和形象授权为引领促进文化制造业创新,加快将文化元素融入制造业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向设计服务领域延伸和服务模式升级,推动文化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以产学研对接与文化教育联动促进

文化教育融合发展;以嵌入式和融入式方式促进文化地产与文化生活、文化社区融合发展;以休闲中国和健康中国为主旨推动文化体育融合发展;以互联网和物联网为载体推动文化物流融合发展。

“互联网+”解决的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问题。所谓供给不适应消费的需求变化,根本原因是没有跟上时代潮流。而“互联网+”大数据就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潮流。所谓“互联网+”就是互联网跟任何一个行业进行结合,效率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的内容是关键。“互联网+”的本质是依托信息基础设施与网络技术实现信息、资源等互联互通、交互共享的平台,应引导更多互联网企业走上科技创新驱动、追求高附加值的发展路径。“互联网+”是一项系统工程,切忌单向应用思维,应注重顶层设计、通盘谋划、系统布局,实现综合推动。

(三)供需市场包容创新,鼓励文化产业试验试错

解决文化产业供需错配的关键是提高文化市场的创新能力,通过全要素的立体创新,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精品化、高端化和优质化。文化的创新来自于文化市场的包容和开放,来自于制度的激励创新。如何培育健康的市场环境,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文化格局,激活文化创造力,解放文化生产力,是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众所周知,制度创新始终是文化产业创新体系的核心,也是创新体系中执行难度最大的内容。然而制度却提供了一种经济的激励结构,随着激励结构的演进,制度决定经济变化的走向是增长、停滞还是衰退^[5]。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对制度的“试验”要求在“试错权”范围内,确定以“立”为主的发展格局,其第一要义是实现文化企业的产品优化和产业升级。创建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需协同发展的某一领域或某些行业的文化产业试验区,可以更好地为文化产业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提供从“试错”到“试验”再到全面总结经验、规避误区的发展范式,是适合文化产业供需市场协同创新的有效探索和尝试。

因此,如何更好地探索和建立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试验机制,使更多文化企业汲取和借鉴文化市场制度创新经验,以“有形之手”破除“市场失灵”,以“无形之手”解决“政府失灵”,通过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增强金融对创新的支持能力,增加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把文化产业结构与文化市场需求结构真正匹配起来。更好地规避试验过程中

的弯路和不足(在有约束的“试错权”范畴之内),实现从试点到全面铺开的文化创新之路,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提高市场对创新行为的引导和甄别能力,从而更有利于市场引导创新至关重要。

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文化发展方式将迎来实质性转变,文化改革创新的整体性、互动性、协调性将日益增强,文化产业融合的广度、强度和跨度也将不断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在全文化市场中角力。显然,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仍是一场长期战、持久战和攻坚战。作为新业态,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它们既体现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发展矛盾与共同困境,又显示着供给端和需求端不同的侧重点和接驳点。而宏观经济政策演化的历史一再表明,供给和需求政策往往是相互转化的,所以单纯地放弃需求谈供给或放弃供给谈需求都是片面的,只有把握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尺度”,把握好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温度”,掌握好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之间的“平衡度”,既不唯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为决定论,也不唯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中的“GDP论”,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创新文化观念、创新组织形态、创新内容形式、创新管理方式,探索和创造一种激励和推动文化生产与传播更加生机勃勃的制度,才能更加理性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参考文献:

- [1] 杨承训,承渝.紧紧依靠科技提升质量、协同供需[J].红旗文稿,2014,(17):17-18.
- [2] 黄凯南.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共同演化:基于演化增长的视角[J].南方经济,2015,(12):2-9.
- [3]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编著.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13.
- [4] 刘亮.供给侧改革仍要与需求侧管理相配合[N].文汇报,2015-12-08(5).
- [5]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选题研究中心.重点领域改革节点研判:供给侧与需求侧[J].改革,2016,(1):35-51.
- [6] 刘拥军.中国图书市场与库存现状及对策[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12-29(9).
- [7] 傅勇涛,周琳,凌军辉,邓中豪.中国出境游人数连续3年全球第1 购买力外流严重[N].经济参考报,2015-11-05(6).
- [8] 新华社财富品质研究院.我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近八成消费发生在境外[N].消费日报,2015-02-03(9).
- [9] 刘亮,李洁,李明月.供给侧改革应与需求侧管理相配合[J].

- 贵州社会科学,2016,(7):117.
- [10] 张翼.2016年上半年文化产业保持快速增长[N].光明日报,2016-08-02(1).
- [11] 常静.重视“需求侧”创新政策,完善新时期创新政策体系[J].科技管理研究,2012,(22).
- [12] 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J].经济学(季刊),2001,(1):19-37.
- [13] 陈劲.协同创新与国家科研能力建设[J].科学研究,2011,(12):1762.
- [14] 刘亮,李洁,李明月.供给侧改革应与需求侧管理相配合[J].贵州社会科学,2016,(7):120.
- [15] 李兴耕,李宗禹,荣敬本.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158.
- 【责任编辑:周琍】

Study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QI Ji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en increasingly optimized and upgraded to be “rational” and “advanced”. Tak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of cultural industry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iming at resolv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we need to focus on key elements and produc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supply side in cultural industry, and tackle the problems with demand side from investment, output and consumption. These ar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co-evolution of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and optimize the driving force for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supply side; demand side

【上接第10页】

Hui Studies and Tibetology: Expression of Regional Cultur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WANG Zhi-wang^{1,2}

(1.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2.History Department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Abstract: Hui studies and Tibetology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s regional cultures. They are both signature brand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ve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in recent years. As for Hui studies, it is the most comple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 key to reveal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As for Tibetology, the snow-covered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like the old home of humanity which bears the imprints of Confucian culture everywhere. Tibetology represents a microcosm of Chinese culture. If Huizhou is the old home for Confucianism, Tibet is then a new home for it as Hui studies embody typical Confucian culture and reflect the gene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ideology in late feudal society while Tibetology reveals Tibet does not only belong to Tibetan people but a part of Chinese nation in historic sense as well.

Key words: Hui studies; Tibetology; region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cultural identity